

张 彬 著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英语翻译与教学创新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英语翻译与教学创新研究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张 彬 /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翻译与教学创新研究 / 张彬著. —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12 (2017.9 重印)
ISBN 978-7-5605-9331-9

I. ①英… II. ①张… III. ①英语—翻译—教学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6054 号

书 名 英语翻译与教学创新研究
著 者 张 彬
责任编辑 王慧宁 侯君英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3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9331-9
定 价 62.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8851 (029) 82668852
投稿热线: (029) 82665370
读者信箱: qsfs2010@sina.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英语的要求不断提高,相应地对英语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是沟通各国人民的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学习外语的重要手段,还是探讨两种语言对应关系的一门学科。学习和借鉴前人总结的翻译理论、方法技巧,可以用来指导、启发翻译实践;但这种指导和启发意义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理论本身,还取决于译者掌握和驾驭两种语言的水平的高低。

作者从事翻译教学多年,有英译汉和汉译英两方面多年的实践经验,但理论研究较少,想对大量实践成果进行总结归纳,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要想做到这一点,教师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英语教学水平,并结合自己的教学不断地探索在中国环境下英语教学与学习的规律。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深入地了解英语教学的基本理论。但是,从目前的师资状况来看,大多数的教师在教学理论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与实践为广大的一线英语教师编著了本书。

本书注重对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近年来国内外外语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读者掌握英语教学的前沿理论,了解最新的发展状况。本书中理论的论述紧紧围绕我国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具体特点,并总结我国长期形成的英语教学经验,使本书对我国英语教学的改革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还有,在论述理论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了对于教学的指导意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易于操作的、科学的指导原则。

本书共九章约 23 万字,由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张彬负责撰写。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吸收了部分专家、学者的某些研究成果和著述内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较大,情况错综复杂,英语教育发展相当不平衡,加之时间仓促,作者的水平有限,写作中的疏漏与不妥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充实与完善。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翻译理论	1
第二节 认识翻译	4
第三节 译学的“一体三环”	7
第四节 翻译的价值	14
第五节 多重转向	16
第六节 翻译研究的途径	19
第二章 从英汉语言对比角度看翻译	25
第一节 英汉对比	25
第二节 直译与意译	30
第三节 文化与翻译	35
第三章 英语翻译策略	42
第一节 中观研究的理据	42
第二节 翻译策略的特征	46
第三节 翻译策略的要素	48
第四节 翻译策略的构成	50
第五节 翻译策略分类	52
第四章 英语中的术语与翻译	66
第一节 术语与概念	66
第二节 术语的定名原则	71
第三节 术语化	73
第四节 术语的翻译	79

第五章 翻译的艺术性	84
第一节 形象的翻译	85
第二节 典故的翻译	90
第三节 辞格的翻译	93
第六章 翻译教学与研究	100
第一节 翻译教学	100
第二节 翻译研究	103
第七章 英语教学理念	115
第一节 英语教学与素质教育	115
第二节 英语教学属于外语教学	119
第三节 英语教​​学的双重目的	122
第四节 英语教​​学的内容	126
第五节 英语教学论的双重属性	130
第八章 英语教​​学的设计	133
第一节 教​​学设计的两个出发点	133
第二节 设计操作的五项原则	138
第三节 四层次的教​​学操作设计	143
第四节 国外流行的英语教​​学模式	150
第五节 国内常用的英语教​​学模式	158
第九章 英语教​​学的技巧	166
第一节 用好教​​学技巧	166
第二节 理解的教​​学技巧	169
第三节 表达的教​​学技巧	174
第四节 人文内容的教​​学技巧	177
第五节 语言点的教​​学技巧	180
第六节 培养自学能力的技巧	184
参考文献	187

第一章 翻译研究概述

翻译学科是一个综合的交叉学科，包罗范围大、研究对象广、涉及学科多。其研究范围大至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小至单个同语的理解和译法。研究对象至少包括翻译的动因、原文、原文作者、原文读者、翻译赞助人、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读者、翻译的结果及其影响等。在我们编撰的译学辞典中，单列的相关学科约有30余个，包括哲学、思维科学、逻辑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交际学、符号学、接受美学、信息论、生态学、阐释学、媒介学等。面对这样庞大的体系，人们不得不考虑分层次研究。

翻译研究一般简单地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指“大范围或涉及整体的”；微观“泛指部分或较小领域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宏微两部分对翻译研究庞大而复杂的体系难以概括。作为宏微两端的过渡和衔接，中间似可加入一个中观研究。在翻译学中，宏观研究要涉及这样的问题：翻译的性质、翻译的价值、翻译的目的、翻译的动因、翻译学方法等。中观研究要讨论的问题有：翻译的规划、翻译的策略、翻译的方法等。微观研究涉及翻译技巧和翻译过程中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本书中，我们从翻译的性质来研究翻译本体论，以“一体三环”作为翻译研究的认识论，以翻译的目的论作为翻译的价值观，以翻译研究的途径作为翻译研究的方法论。

本章介绍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概况和一般原则。

第一节 翻译理论

有些译者往往否定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构成的作用。其实，译者经常浸润在翻译问题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理论上思考着（不论这种思考从何种视角），这就是所谓的翻译的“理论化”（theorizing in translation）。

一、翻译的“理论化”

皮姆(Pym)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理论化。例如,在翻译过程中一旦发现了某个翻译问题,译者往往在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中做比较选择……也许这些方案各自适用于相应的语篇、目的和客户的特定要求。译者构想这些方案(生成可能的翻译策略)并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一个最终的翻译方法)可能是一件困难和复杂的事情,但却可以在瞬间同时正确地做到。每当译者决定选择这个译法,排除其它译法时,他们都掺杂了一系列关于翻译是什么、该如何翻译的看法,他们在进行“理论化”,理论为生成和选择过程设置了背景。因此,作为翻译实践的一部分,译者在经常进行理论化。(Pym,2010:1)

皮姆认为,当译者与其他人讨论该问题时,个人的“理论化”过程公开化了。讨论过程中,他们需要借助一些大家有共识的词汇,例如“源语”(source text)、“译语”(target text)等。虽然这些术语并不一定表明谈论者在使用某个理论,但他们往往形成了一定的“翻译模式”(models of translation),而这些模式的后面常常隐藏着某种非常强大的指导思想。这样,相关的术语构成了模式,这些模式又形成了理论,为翻译可能或应该做什么设置了思想背景,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皮姆指出,只有当人们对于翻译的选择产生了分歧,并就此产生了争论,“理论化”中具有共同核心、共同出发点的一系列理论便构成了一个理论范式。(转引自王鹏,2010)

中外翻译研究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总体上殊途同归。我国学者虽然较早萌发翻译研究的学术意识,体现了传统美学的文化精神,如蒋翼振早在1927年就出版《翻译学通论》,提出“翻译学”这一术语,但是印象式、感悟式、经验式的研究方式较长时期笼罩着我国译界,直到半世纪前引进外论,翻译研究方始与现代学科相结合。中西方译论的一个基本不同点是“中国译论重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西方译论则重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因此,中国的传统译论体系谈论翻译困难、翻译方法、翻译经验的多,是一种趋向微观层次的译论体系。相反,西方的传统译论体系则谈翻译原理、翻译种类、翻译属性的多,是一种趋向宏观层次的译论体系。”(谭载喜,2012)。

一般认为,中国理论思维的特点是感悟强于思辨、生命体验强于逻辑分析,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我国学者在认识语言共性和语言个性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考,对于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入。我国的译论研究,从早期的印象式、随感式、经验式,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译介式、评点式和接轨式;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证式、批评式、创新式研究新风渐起。西方译论在我国译坛的绝对强势已发生根本

变化,国人翻译理论上的“失语症”已获治愈,我们看到了一批包括生态翻译学在内的我国学者自主开发的成果。而我国的应用(文体)翻译研究更是以适应国际文化交流、面向社会、面向经济、面向市场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其规模之大、挖掘之深、探讨之细体现出了我国学者紧跟时代潮流,博学慎思,有所进取。

二、“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既是世界观、价值观,又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它展开了一个动态、多元、升华的视域,对于理解翻译本质、翻译与人之间关系等本体论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作为价值观,它承诺了一个尊重差异又谋求认同的合作、协调的精神,有利于探究翻译的伦理及文化生态问题。作为认识论,它指出了一个摆脱二元思维定势并通过翻译获得新知的路径。作为方法论,它是平衡综合性和分析方法的工具,有利于思考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桥接,从策略上促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一个高度的理论概括,“一分为三”的视域已经获得翻译理论和实践自身的实证和多个学科的佐证。

近代马建忠的“善译论”融通了两个三分的格局,兼顾语言、义理、神情以及原文(作者)、译文(译者)、阅读(读者)。而严复的信、达、雅三元标准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统一体雅”不可或缺地唤起人对言的敬畏和尊重,作为中介能动地使信和达结合、互动,使译文升华为完善、适切的译文。“雅”既有“中庸”的伦理根基,又有“和合”的美学理想。现代翻译观中三元标准还有形似、意似、神似(陈西滢),忠实、通顺、美(林语堂),译言、译意、译味(金岳霖)等。“一分为三”的方法论在许渊冲的译论中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他的“三美论”(音美、形美、意美)、“三化论”(浅化、等化、深化)、“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三似论”(意似、音似、形似)、“三势论”(优势、劣势、均势)以及他的优化论、竞赛论、艺术论等都渗透着“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他批判翻译的“准确和完整”标准,认为这是把翻译笼而统之地当成了科学。(庞秀成,2010)

我们把本体之外、与翻译相关的学科分为三个层次,恰好与这一视角耦合。本体之外的内环(一环)、中环(二环)、外环(三环),既表示与本体关系的远近、密切程度,也表示译学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层次。内中外三环三位一体,三者本身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对翻译本体构成不可或缺的共同体。

说来也是,译学本体也可以三分:翻译原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研究涉及翻译现象的各种问题;翻译史描写自古至今翻译的进步和译论的发展;翻译技术则在工具层面上解决翻译问题,包括词典、计算机、网

络及其他翻译工具和手段。

当然,“一分为三”只是看问题的总体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排斥“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的分析方法。

第二节 认识翻译

人们认识事物的本体往往从该事物的性质开始。

翻译是一种尽人皆知的社会行为,但要给翻译下一个既全面又严密的定义,还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这正应了辞典编撰家 Berger Evans 在 *But What's a Dictionary For?* 中的话如果真的相信显而易见的事物容易下定义,那么你就掉进辞典编辑学最大的陷阱中去了。相反,对于新奇独特的事物,谁都能很好地描述,而凡是俗情却难下定义。因为正是事物的这种普通性质,迫使我们要用不普通的词语来下定义。”

一、先贤之见

翻译是一种最普通的事情,人们从不同认识、不同角度、不同需要给它下了无数定义。让我们来看看有代表性的高见。

1927年,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横空出世,在广漠的学海上空划出一道闪亮的光芒。在世界学术史上,词语意义的“翻译学”从此诞生。蒋氏对翻译学的定义很简单:

用乙国的文字或语言去叙述甲国的文字或语言;更将甲国的精微思想迁移到乙国的思想界里,不增不减本来的面目;更将两国或两国以上底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或两系以上文明的化合,这个学术,叫做翻译学。(蒋翼振,1927:5)

蒋氏的话以分号为界分三段,前二段涉及翻译,后一段直指翻译学,方法论上是比较(研究)和综合(化合)。可见,对于翻译学,我国学者80余年前已开始有了朦胧的学科思想,尽管离开今天谈论的翻译学的学科体系差距甚远,但在那个时代实属远见卓识,世界领先。可惜国人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并未紧随其后作系统研究,对翻译学有所建树。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虽然我国译家译论不断,再现了传统译论的精髓,但翻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似仍渺茫。

茅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对翻译,特别是对文学翻译,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

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染和美的感受。”（转引自罗新璋,1984:511）他又说，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和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同上）。茅盾从文学角度来阐释翻译，有人根据他的论述，概括地提出：翻译是艺术、是创作、是科学、是技术。这里笼统地指出翻译的四个方面的特征，但并未对“翻译”一词作有效的界定。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翻译，首先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把翻译看成是具体言语的转换，而不是语言系统的转换。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译出语）的话语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对等的话语材料”。（Catford,J.C.,1965）

一般辞书则给出比较通俗的、不带学科倾向的定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的《辞海》把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则补充了“翻译”的内涵，表达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上述两项表达都强调语言文字的翻译，即笔译，而翻译的概念显然应包括口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A continuous concomitant of contact between two mutually incomprehensible tongues and one that does not lead either to suppression or extension of either is translation.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acropedia)其意为：两种语言不通的人，在接触过程中需要伴随一种连续的手段，这种既不扩大又不缩小原意的手段就叫做翻译。concomitant意为“相伴物”“伴随的情况”，这实际上包括口头的伴随过程（口译）及书面的相伴材料（笔译）。

以上从语言学角度的定义和三种工具书所提出的定义都只强调意义的准确表达，对翻译过程中形式的处理没有规定，即没有顾及翻译的意境、文体、功能和目的等，因此作为翻译学科的术语是不充分的。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给翻译下定义时局部克服了上述缺陷。他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奈达的表达一度为译界更多人所接受，是因为：（1）奈达把翻译的逻辑重点放在“再现原语信息”。（物质、能源、信息是当代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三者是流动的。在信息流动中，翻译的功能在于“再现原语

信息”。)(2)奈达不但重视语义,而且也重视文体风格的再现,他强调“如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其中包括文体风格方面的信息。(3)奈达所说的“最贴切”是对原文内容而言的;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而“最自然”是就译语而言,即要使译语读者(或听者)感到自然通达。这样,才能使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达到等效。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翻译概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了,界定概念的定义需要不断完善,以更精确、更全面地反映现实。这是因为:(1)相邻学科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2)翻译操作的对象不局限于自然语言。(3)社会对译品需求的形式多样,不局限于完整的语篇,不一定需要“从语义到文体”再现原语的全部信息,可能要求部分地或综合地再现原语信息。再说,翻译不仅仅是由人直接参与的口译或笔译,可以是光电编码器信号的转换、人机互译、机器翻译等。对此,奈达给翻译所下的定义又不完全适用了。例如,在自动数据处理中,翻译被定义为:“将计算机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将字符从一种表示转换成另一种表示。”

二、当代之说

“翻译”是一个多义词,用英文可区别出它的不同含义和不同用法,主要有以下五义:(1)翻译过程(translating)。(2)翻译行为(translate/interpret,例如:他正在翻译一篇文章)。(3)翻译者(translator/interpreter,例如:请个翻译来)。(4)译文或译语(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例如:他的翻译不地道)。(5)翻译工作(事业)(translation,例如:他干什么的?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在《译学辞典》(2014)中按“翻译过程”定义“翻译”如下:

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思维活动。

这一定义包含三层意思:(1)翻译的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的“社会认知需要”。(2)翻译活动的操作空间存在于“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3)翻译的性质是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思维活动。

翻译离不开社会认知的需要。自古以来,翻译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集团利益来进行的。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引进,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翻译,无不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除了社会需要之外,翻译的认知需要也包括个人需要。例如,有人以翻译为手段聊以自勉、自习、自用、自娱等。但是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一种社会活动,因为传递信息的符号一般具有社会性。根据社会需要,翻译分不同类型的口译和不同形式的笔译。

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译者主要跟语言符号打交道,所以“不同规则的符号”主要指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此外,还有计算机语言、工程图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语言、文化与社会不可分割,所以“传递信息”不是单纯的不同规则的转换,而是语言的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转换与传递。语言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之中,生动地反映着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心理特点。翻译必然涉及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

翻译是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思维活动。信息内容包括语义的、文体风格的、文化的。传递方式可以是书面的、口头的、图像的、机器的或人机交互的。思维在翻译活动中一般都要通过人类思维这一重要的智力媒介,即使是机器翻译,也是人类思维的间接表现方式。上述定义中没有对传递的质量加定语,诸如“等值的”“等效的”“动态对等的”等。进入社会的译语或译品就像别的社会产品那样,可能是优等的、合格的或次劣的,应有一定的标准来衡量。

第三节 译学的“一体三环”

顺着时间的脉络,笔者把翻译学科发展路径和构成比作一个特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环绕中心城区,北京的交通已经有6条环线,上海也有内环、中环和外环。大城市虽然规模大,但交通有条不紊。译学的体系虽然繁杂,但也应该环环相扣,纵横相通、本体与外围学科交叉、照应。译学的本体和外围学科形成“一体三环”,可以看作译学发展的路径及其基本构成。所谓一体就是译学本体,三环就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外围学科的三个不同层次,亦即译学外部系统的三个不同层次。译学外围学科的术语,由于它们所表达的概念与译学本体概念相契合,经过术语化过程而进入译学本体,成为译学术语的一部分。

从哲学上讲,“翻译的本体研究与外围研究体现了‘一与多’的关系。本源与替补、本源与延异的关系说明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刘军平,2009:164)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译学发展的时空路径“一体三环”图,如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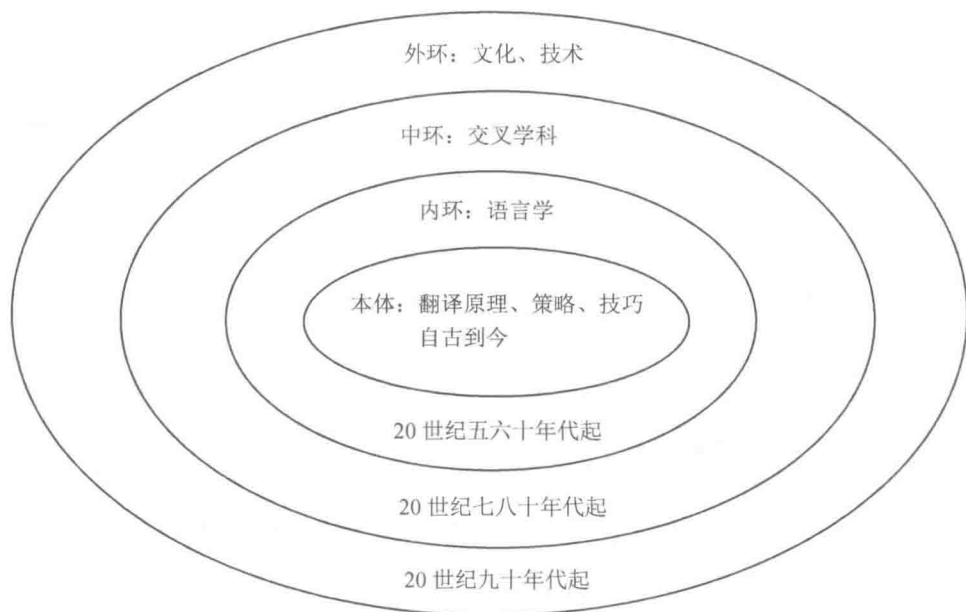


图 1-1 时空路径“一体三环”

一、译学本体

本文所指的本体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指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现代化城市无论多大，最能体现城市本质和功能的往往是早期形成的中心城区，城市中心区域以外的部分都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中心区域本身同样在发展。译学本体好比中心区域。其中包括翻译原理、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三个方面。

翻译研究起步之时，正是译学本体孕育之日。经过上千年的发展研究，译学本体已蔚为大观。翻开任何一本翻译史，直译意译、口译笔译、作者译者、源语译语、忠实通顺等术语扑面而来；到了近现代，可译性不可译性、欠额翻译超额翻译、重译复译、信达雅、化境、神似、三美、归化异化、翻译单位等本体概念不绝于耳；而在当代，伪翻译、深度翻译、元文本、杂合文本、拟作、隐形、诗学、赞助人、机器翻译、本地化、翻译技术等令人眼花缭乱。

在译学本体发展过程中，有的传统概念被淘汰或边缘化了，但不少传统因子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些传统因子被外围学科所激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当然本体的壮大还有赖于外围学科直接注入新概念、新思想。

译学是一门交叉性、开放性学科，光有本体不足以成体系，就像一座城市如果只有市中心而没有周边城区，就不配套，不成其为城市。语言学科是翻译学的最重要、最直接、也是最早形成的外围学科，构成译学的一环，或

称内环。

二、一环

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是翻译学的奠基性学科，构成一环。

1953年，苏联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问世。该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作了较系统、较全面的阐述，把翻译理论列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认为任何作品的翻译都要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翻译的等值就是完全准确地表达原文思想并在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该书还提出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分别讨论了翻译中的词汇、语法和文体问题。针对当时苏联翻译界文艺学派的质疑，1958年，作者在该书第二版中“坚持认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翻译是正确的，他强调指出，文艺翻译有特点，应突出其美学方面，但是文学形象是用语言创造的，也必须用另一种语言的手段来传达，因此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是基础。并在书名上加了副标题‘语言学问题’”。（蔡毅，段京华，2010:7）

另一位翻译理论的语言学研究的奠基者是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他出生于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雅各布森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该文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及其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该文自1959年发表以来一直被西方奉为翻译理论的主臬。雅各布森提出翻译分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针对语际翻译他提出“信息对等”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以奈达和纽马克为代表的语言学派把语言学翻译理论推向纵深。此后，随着语言学科自身的发展，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走过了对比语言学、语法学（特别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语义学的阶段，步入以系统功能语法、文体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批评语言学为导向的阶段。

现代语言学把人们对人类语言的看法及其研究成果概括成一般理论。人类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些普遍特征。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例证，不仅已见诸各亲属语之间，而且也存在于非亲属语（如英语与汉语）之间。语言间的共同之处，绝非巧合，而是由于人类有着某些共同的自然历程和生活经验，甚至有某些共同的思维方式，这是不同语言对译的基础。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语言活动。翻译过程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尽管在转换过程中还有其他因素。现代语言学为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和实践指向,从操作层面上讲,翻译更离不开语言学的指导。语言学使翻译研究从经验和感悟向着科学研究跨出了第一步,语言学科自然成为紧贴本体的第一层面的外围学科,构成本体之外的第一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一统天下。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利用语言学中现成的、规范的术语和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的出现的语言现象。翻译语言学将整个翻译活动纳入语言学的轨道,把翻译研究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把翻译看作“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不变,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1985:4)认为翻译理论最主要的是研究和对比在语言中和在话语结构中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它的主要任务是描述和揭示从原语到译语的转换规律。

描述和揭示从原语到译语的转换规律需要工具和手段。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借来一大批现成的概念和术语,包括研究必备的基础性术语,如转换、结构、主位、述位、形合、意合、迁移、切分等。这些术语有的按译学规律内涵或外延有所调整,有的直接拿来使用。可以说,没有语言学的参与,翻译研究是难以为继的。

我们所说的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包括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系统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篇章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副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模糊语言学、国情语言学、宏观语言学、微观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语用学等等。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在研究中发现,语言学不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翻译研究还需要别的学科的支持。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需要借助各相关学科的学术养分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翻译研究的脉搏随着相邻学科的发展而跳动。相邻学科凡有新发展,其原理或方法往往会引进到翻译研究中来。近五六十年来,语言学科、思维学科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迅速发展,引用到翻译研究上来,带来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可以这样说,在前人千年耕耘的这块沃土上,众多现代学科造就了译学的今天;现代语言学催生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语用学派生出语用翻译学,符号学促成了翻译的社会符号学派,哲学上的解构主义孕育出解构主义翻译观,交际翻译学派的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和社会语言学,女性主义翻译观和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各有其理论背景,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有文化学和政治学的动因和背景。

三、二环

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从文本到文本、从语言单位到翻译单位。但是,翻译需要研究的对象大大超过语言的范围,它涉及翻译的动因、翻译过程、翻译

的结果及其影响。翻译的研究对象至少包括原文、原文作者、原文读者、翻译赞助人、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读者。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正逢翻译学的一些相邻学科蓬勃发展, 译学研究随之横向扩展, 形成了译学本体之外的第二层外围学科。第二个环路是由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符号学、接受美学、信息论、交际学、阐释学、媒介学等学科形成的。二环里边众多学科与本体的关系虽然不像语言学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 但它们提供了翻译学的立论基础、论证方法、参照条件以及论证工具和手段。没有这些学科的支撑, 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科是不完整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 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向综合性学科过渡。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由于哲学思维的思辨性, 哲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最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在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解构主义翻译观, 在民族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民族主义的翻译观。

思维科学和心理学是研究译者的思想武器和有力工具。翻译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双语转换活动, 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译者直接受语言信号的刺激而在头脑中产生一系列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的过程。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可阐释翻译心理活动、心理定势、译者个性, 心理结构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原文作者的创作心理,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有助于探知读者的反应与需求。翻译的心理研究还通过有声思维法(TAPs)对译者的翻译思维活动进行试验和测定。

符号学是分析符号的最全面的系统, 文字符号的意义永远涉及一定的社会情景。对符号的解释与符号的结构有关。任何文字符号的意义只能借助于其他相关的符号才能得到解释。符号学能多视角地、综合地认识和解释翻译, 将翻译与社会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将两种语言符号转换过程中意义传递的性质和功能说明清楚, 所以符号学的理论原则可以成为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把翻译行为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 即在社会语境下的一个包括群体和社会行为在内的复杂的交互行为。作为语言信息转换的翻译生产过程, 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提供的知识生产过程, 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 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 形成一个翻译网络, 并为实现翻译的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翻译网络中不存在孤立的译者。除了译者外, 翻译中还存在各种既合作又对抗的行动者, 如作者、读者、译者、编辑、出版商、翻译评论者、翻译审查者、赞助人、封面设计者以及其他组织机构的决策、促销策略、版权政策、稿酬制度等。翻译的成功依赖于动员各个行动者, 相互协商、妥协, 重新确定各个行动者在翻译网络中的角色,